

影响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风格的因素

郭 华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本文从柴可夫斯基的悲剧性的性格、不幸的感情生活、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四方面入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其音乐创作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悲剧性 感情生活 社会背景 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J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11-0095-02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这块土地塑造了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等许多文学巨匠,而柴可夫斯基也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土地上,所以在他的身上与作品中都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性格。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将近三十年,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音乐体裁和形式。在他的音乐创作中,他将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的情感以及对本民族音乐继承和民间音乐的热爱融合在一起,显示出其特有的个性和悲剧性风格。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以其深邃的情感内涵著称,在其创作的不同时期,作品中都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情感。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形成了他音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呢?

一、悲剧性的性格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艺术家的。他的性格内向、孤僻、脆弱、极端的情绪化而且忧郁敏感,是一个不喜欢交际、漂泊无依的、孤独的人。他向往的是一种物质上精神上都不会使他陷入困境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生活。他希望有一个能让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艺术环境。他渴望能建立一种使自己得到慰藉的、幸福的感情生活,在感情上寻求一个寄托和归宿。他生于贵族家庭,从小他的性格就特别脆弱敏感。他童年的家庭教师芬妮·杜芭赫小姐回忆起柴可夫斯基时,这样说道:“彼得实在敏感得过分,因此不得不十分小心地对待他。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刺伤他。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柴可夫斯基一生承受着敏感天性的折磨,他是一个神经官能患者。但是,他以后所谱写的一些最富于个性的感人乐章,体现的正是他的这种天性。

二、不幸的感情生活

在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同一位法国女高音歌唱家德西蕾·阿尔托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分离是因为一方不愿意离开舞台,另一方不愿做名伶的丈夫。这段恋情使柴可夫斯基一生都为之感伤。另外在他的

一生中還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时,与一名偏执的女学生安东尼亚·米露可娃结婚。这段婚姻对柴可夫斯基的打击是致命的,以致于他曾决定自杀。他走到莫斯科冰冷的河中,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水中,盼望染上肺炎,来结束自己悲苦的一生。而柴可夫斯基把这一切归结于命定的悲剧,是对于他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惩罚。尽管婚姻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但身为同性恋的柴可夫斯基对于婚姻的憧憬却从未消减。他对于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与他的同性恋天性的矛盾,使他一生都充满了痛苦的挣扎。这反映在他的音乐里,尤其是晚期的交响乐作品中。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建立了长达十四年的书信友谊,这给了柴可夫斯基极大的精神安慰,以至于他后阶段的许多作品都是献给这位夫人的。柴可夫斯基非常珍视她的关怀与真挚,他曾写道:“如果您能知道,您给了我多大的帮助就好了。我已濒临绝境。多亏您的友谊挽救了我。我现在已能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对于我就毫无意义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您是怎样做的,都同样令人钦佩。从今以后我写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将奉献给您。”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记录,是他那一时期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怀着极大的热诚写第四交响曲,他说:“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爱过一部作品。”但奇妙的是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在与冯·梅克夫人交往的十几年中,柴可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与冯·梅克夫人的友谊最终也以悲剧的形式而结束。这对柴可夫斯基来说,简直是不可置信的。他对世上的一切都丧失了信心,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只有在音乐创作中来慰藉自己重创的心灵。

三、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

柴可夫斯基生活的年代正是沙皇俄国在政治上腐朽没

* 作者简介:郭华,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落的黑暗专制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俄罗斯人民的悲惨遭遇使他看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出路，无法解决的悲剧性矛盾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无比的担忧。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始终是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思想倾向。但柴可夫斯基绝不是一个悲观宿命论者，即便在他最为悲剧性的作品中也贯穿着一种抗争的精神。“他以真实的思想家的深刻性，以大艺术家的直觉感到了单独的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命运的发展的，矛盾的、辩证的道路。不过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绝没有宿命论、阴郁性和相信盲目的命运的痕迹。他最具有悲剧性的作品，也贯穿着斗争的精神、制胜不可抗抗的力量。”——（肖斯塔科维奇在《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一点感想》）

1876年4月保加利亚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遭到土耳其的残酷镇压，这激起了全世界先进人士的愤怒。保加利亚爱国者大量牺牲，这使斯拉夫民族独立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夫民族运动有所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这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一个阿克萨科夫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愿飞临的地方。”柴可夫斯基虽然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但又反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沙皇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然而严酷的现实彻底毁灭了他的幻想。他深深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悲剧性，这是19世纪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而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第五交响曲》，正反映了作曲家本人以及他的广大的同时代人的这种心情。他只有不停创作作品来驱除精神上的苦闷。完成了《第五交响曲》、《哈姆雷特》序曲，并着手写芭蕾舞剧《睡美人》。进入90年代后，俄国社会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人们称整个这个时期是19世纪俄国最“灰暗和无所作为”的时期，是俄罗斯社会生活死气沉沉的“暮年”。这时期也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临近终结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艺术创造达到最成熟的时期，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巅峰的

（上接第86页）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权力。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无论是在反思中原文化、思索民族生存还是揭示“文革”荒诞，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他的这些小说中，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现代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均都处于遭受质询进而被有效解构的尴尬位置，它们通过对乡土中国权力本质的深刻揭示，有力地解构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神话，揭示了主流政治文化的虚妄，显示出强烈的反思色彩。

阎连科作为一个“逃出”乡村的城里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新观念的滋养，当他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自己所熟悉的故乡村镇、乡间人物、民情风俗时，作品就具有强烈

作品，一个是歌剧《黑桃皇后》，另一个是《悲怆交响曲》。歌剧《黑桃皇后》是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创作的同名歌剧，是柴可夫斯基用音乐戏剧的体裁，来体现他对人生的悲剧性理解的一部杰作。《悲怆交响曲》是一部足以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的作品；是对柴可夫斯基一生的总结，是一幕人的心理悲剧，一生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渴望和憧憬，最后只能以诀别人生的死亡告终。

四、文化背景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融汇着两种文化的特质。一方面他的音乐扎根于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土地上，音乐中透露着他对土地十分热爱的深厚情谊。在柴可夫斯基的大部分音乐里，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他将民族文化与西方交响乐传统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尽管柴可夫斯基结识了“强力集团”，但是他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民族主义团体。柴可夫斯基曾写到：“至于我对音乐里俄罗斯元素的关注，是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异国，在我年幼的时候，俄罗斯音乐无法描述的美丽就已经充满了我的生命。”柴可夫斯基的第一、第二、第三交响曲都可看成是这一特征的主要反映。也正因为如此，斯特拉文斯基说他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彻底的俄罗斯人。”柴可夫斯基善于继承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运用民间曲调创作了不少雅俗共赏的精品，弦乐四重奏D大调·作品第十一号，就是根据民歌《寂寞的凡尼亚》创作而成的，那婉转的旋律，“如歌的行板”、丰美的和声和渗透伤感忧郁色彩的情调，竟使得老托尔斯泰听了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就说明，多愁善感的柴可夫斯基，他那颗孤独而又灼热的心，是紧紧贴着祖国大地的。另一方面，与格林卡和“强力集团”作曲家相比，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风格有更多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明显反映出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意大利的歌剧、法国的芭蕾舞、德国的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的优秀传统都被他融会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并打上了他自己的鲜明个性。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今天依然震撼着我们每个倾听者的心灵，这位饱经沧桑的音乐家，在欧洲19世纪音乐的舞台上独树一帜，为丰富人类音乐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纵观阎连科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两程故里》就已经确立了它对乡村社会内部的权利机构与宗法伦理之间纠葛的深度拷问，在随后的“瑶沟系列”里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到《受活》与《丁庄梦》他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叙事立场：以乡村贫民的生活为叙事背景，倾情演绎创作主体对权利体系的结构性的反思。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能够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极限，也延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极限，更延伸到中国式权力的极限特征和运作的深层逻辑中。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巨变，阎连科从对这种巨变的深入反思中已经揭示了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疯狂、残酷、野蛮与不人道，更揭示出中国乡村自身（包括农民）的劣根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